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HEBREW CLASSICS

希伯来经典研究文集

Hebrew Classics: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钟志清 编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希伯来经典研究文集

Hebrew Classics: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钟志清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伯来经典研究文集 / 钟志清编选.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10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8011-7

I.①希… II.①钟… III.①犹太文学—文学研究
IV.①I1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4747 号

希伯来经典研究文集 钟志清 / 编选

责任编辑 王 珏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王 敏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8011-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

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失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模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传承和丰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由二十二部学术史研究专著、二十二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辑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辑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

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第三辑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叟、简·奥斯丁、普鲁斯特、泰戈尔和希伯来经典。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前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

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

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编选者序

本书题目所言“希伯来经典”指《希伯来圣经》。历代的圣经研究成果浩如烟海。编选者在精选圣经学术史文集篇目时无疑面临着重大挑战。

从编选思路上看,我们希望要**兼顾所选篇目在圣经学术史上的经典性、开创性、代表性和地域性等诸多特征**。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立项时的设想,文集中所收入的文章应为译文,因此未能包括中国大陆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

在“圣经研究的各种倾向”部分中,《让百花齐放:阅读与研究〈希伯来圣经〉的一些思考》一文出自美国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圣经学术史专家彼得·玛施尼斯特(Peter Machinist)之手,他探讨了《希伯来圣经》研究的复杂性,而这些复杂性对中国学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论圣经阐释》选自其《神学政治论》,该书标志着现代圣经研究的起点。赫尔德的《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乃是基督教学者对希伯来文化传统进行阐释的名篇。其后,遴选了圣经来源批评开创者维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形式批评开创者贡克尔(Hermann Gunkel)、结构主义批评大师巴特(Roland Barthes)、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代表人物博尔(Roland Boer)、女权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特利波(Phyllis Trible)、后殖民主义批评代表人物塞戈维亚(Fernando F. Segovia)的名篇。继之,展示了时下亚洲圣经研究的成果,包括以色列阿密特(Yairah Amit)和奥兹-萨尔兹伯格(Fania Oz-Salzberger)、中国香港李焯昌(Archie Lee),以及日本左近丰(Tomu Sakon)和韩国李亨元(이형원, Lee Hyung-won)几位学者的论文,呈现出亚洲学者的研究视角。

在“圣经与文学”部分中,我们选择了现代圣经文学批评先驱罗伯特·奥特(Robert Alter)的早年作品,之后选择了美国圣经文学大家库格尔(James Kugel)和列文森(Jon D. Levenson)的论文,向大家展示现代意

义上的圣经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的论争。继之的柏林 (Adele Berlin)、斯腾伯格 (Meir Sternberg)、布伦纳 (Athalya Brenner)、巴顿 (John Barton) 等学者均为 20 世纪圣经文学研究的重要实践者。

最后三篇论文属于“圣经阐释与文学理论范畴”，出自大卫·H. 斯特恩 (David H. Stern)、杰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迈克尔·费施贝恩 (Michael Fishbane) 等美国犹太学者之手，所论及的犹太圣经阐释与文艺理论之关系，乃 20 世纪圣经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

在此，请允许我向在百忙中参与本书翻译的各位译者，向慷慨承诺我可使用《圣经文学研究》辑刊中诸多篇目的梁工主编，向认真阅读了选篇目录并给予中肯建议的玛施尼斯特、列文森、斯特恩教授致以由衷的谢意。还要提及的是，哈佛大学列文森教授、特拉维夫大学阿密特教授、海法大学范妮亚-奥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炽昌教授为支持“希伯来经典研究”项目，慷慨允诺出版社免费使用其论文，委实令人感动，在此谨表谢忱。最后，还要感谢王珏女士在编辑这部涉及多位作者与译者、多种文化与知识背景的繁复文集时付出的艰辛。

编选者序 1

圣经研究的各种倾向

01 让百花齐放:阅读与研究《希伯来圣经》的
一些思考 3

彼德·玛施尼斯特

02 论圣经阐释 12

巴鲁赫·斯宾诺莎

03 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 29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04 六经叙事 44

尤里乌斯·维尔豪森

05 传说的意义与范围 54

赫尔曼·贡克尔

06 “雅各与天使摔跤”(《创世记》32:23-33)的
叙事结构分析 61

罗兰·巴特

07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希伯来圣经》阐释 73

罗兰·博尔

08 女性主义诠释学与圣经研究 90

菲利斯·特利波

09 走向后殖民主义视角 96

费南多·F.塞戈维亚

10 以色列的《希伯来圣经》研究:介乎情感
与学问之间 110

伊艾拉·阿密特

11 当代以色列话语中《希伯来圣经》的
政治运用 119

范妮亚·奥兹-扎尔兹贝格尔

范妮亚·奥兹-扎尔兹贝格尔

- 12 你那如海般深邃的哀伤,谁能治愈? 136
——《圣经·哀歌》的文学研究
左近丰
- 13 巴别塔故事(《创世记》11:1-9)的文学性分析(节选) 157
李亨元
- 14 对圣经的女性主义批判以及文化中的女性原则 166
李炽昌

圣经与文学

- 15 圣经诗歌的特征 181
罗伯特·奥特
- 16 论圣经与文学批评 195
詹姆斯·库格尔
- 17 关于罗伯特·奥特《圣经叙事的艺术》 219
乔恩·列文森
- 18 圣经文学的文学进路 222
阿黛拉·柏林
- 19 圣经诗学与性别政治:从阅读到反阅读 249
梅厄·斯腾伯格
- 20 女性诗人与女性作者 278
阿特尔雅·布伦纳-伊丹
- 21 “文学”批评 289
约翰·巴顿

圣经阐释与文学理论

- 22 古代犹太释经学与文学理论 301
大卫·斯特恩
- 23 文本之弈 315
杰弗里·哈特曼
- 24 古代以色列诠释的类型与策略 329
迈克尔·费施贝恩

圣经研究的各种倾向

01 让百花齐放：阅读与研究《希伯来圣经》 的一些思考*

[美国] 彼德·玛施尼斯特

钟志清 译

《希伯来圣经》是一部极其复杂的书。其复杂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本书着重讨论了其中三个复杂性。首先，《希伯来圣经》并非单一的一卷书，而是由许多书卷组合而成：24卷，36卷，或者39卷，视悉数方式而定。然而，这些书卷，长度不同，体裁与内容也不同，主要由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两种语言写成，卷与卷之间会有重复。这一多样性乃圣经的标识，从古希腊术语“集成”（“ta biblia”，意为“卷轴”）延伸而来，最终被理解为“书卷”。

3

其次，《希伯来圣经》涉猎或引发思考的内容非常广泛。本书所探讨的内容包括：圣经叙事美学，这方面的例子有《创世记》第34章中关于方兴未艾的以色列人与示剑人的相遇；性别问题，尤其是用女性主义方法来阅读《希伯来圣经》中女性地位的问题；《希伯来圣经》如何成为《希伯来圣经》，即《希伯来圣经》的经典化以及书面文本神圣权威诞生的过程；古代以色列历史，以及《希伯来圣经》充当，甚至成为历史重要来源的过程；古代以色列的物质文化，以及如何通过圣经与考古数据对这些内容加以探讨；对《希伯来圣经》所作的犹太神学研究；圣经律法的特征，以及圣经律法在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律法框架之中的形成背景；献祭的意义与《希伯来圣经》中的献祭体系；古代以色列的拜神风格，以及其后的犹

* 本文最早是一篇后记，见于 Frederick E. Greenspahn. 2008. *The Hebrew Bible: New Insight and Scholarship*.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9-218. 此处独立成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淡化了“本书所说”之类的词句。